



.27

# 埃德加·斯诺传

(美)约翰·汉密尔顿 著 柯为民 萧耀先 译

辽宁大学出版社

# 埃德加·斯诺传

[美] 约翰·汉密尔顿 著

柯为民 萧耀先 等译

陈 強 审校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沈阳

责任编辑 王海晨  
封面设计 陈景泓  
责任校对 章莹棠

埃德加·斯诺传  
〔美〕约翰·汉密尔顿 著  
柯为民 萧耀先 等译  
陈弦 审校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日报印刷厂印刷

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260千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610-1068-0  
K·78 定价：平5.50元  
精7.50元

(辽)第9号

**Edgar Snow, A Biography**  
**By John Maxwell Hamil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由于我的同情心、我的身世、我的教养和我所信奉的原则，我被说成是一个革命者。我总是站在革命者一边，因为如果没有那些压迫和无法忍受的状况，就绝不会有反抗它们的革命。

——马克·吐温

革命并不是由革命者或他们的宣传所造成的，而是在恶劣、无能和腐败的政府统治下那些无法忍受的状况所造成的。在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够使更多的人相信，他们有值得为之而战斗和牺牲的事业，而蒋介石从未能做到这一点。

——埃德加·斯诺

## 鸣 谢

我开始为写作这本书而进行的研究工作，是在1972年埃德加·斯诺去世后不久。从那时起的这些年来，我作为一名派驻海外的记者和政府的雇员，断断续续地一直在进行这项研究工作。在此期间，许多了解埃德加·斯诺的人帮助了我，他们同意接受采访和提供资料，并提出了往往是很有价值的建议。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是无所畏惧、社会良知和正派品行的楷模。我在各方面对他们的感激，在这本书中是表达不尽的。

这些接受采访和提供资料的人的姓名，列在本书后面的说明之中。在此，我想举出几位，头一位就是洛伊丝·惠勒·斯诺。虽然斯诺夫人并没有委托我写这本书，但是她如实地回答了我的提问，为我获得她丈夫的资料提供了方便。我钦佩她的坚定的信念，以及她对她的丈夫和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责任感。已故的玛丽·希思科特，也是一位依靠信念生活的妇女。她从一开始就鼓励我，倾听我的叙述，尽管她知道的事情比我多得多。海伦·福斯特·斯诺，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位妻子，她自己也与30年代的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两次长时间的采访中，她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背景材料和来往信件。谢伟思是当代历史上的一位典范人物，他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手稿并给予了价值无量的指点。我也要感谢J·霍华德·斯诺、米尔德丽德·斯诺·麦基、多萝西·索尔兹伯里·戴维斯和哈里·戴维斯、西尔维亚和比尔·鲍威尔、

罗伯特·巴尼特、路易丝和伦道夫·赛勒、特鲁迪·谢弗，以及为我花费了整整一个晚上时间的前外交部长黄华。在去中国的旅行采访中，我还采访了其他一些中国人，按照他们的要求，我没有把他们的名字列入本书的说明之中。我尊重他们的意愿，在此一并致谢。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朋友们和同事们的帮助。约翰·H·沙利文这个总是乐呵呵的朋友，根据他自己关于亚洲的广博的知识，提出了研究思想，并对我的全部书稿提出了建议。查尔斯·亚历山大阅读了这部书稿，并且总能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乔治·克里姆斯凯、保罗·C·内格尔和唐纳德·沙诺对这本书的许多部分提出了有益的修改意见。利奥·里布福和霍华德·吉勒特以及劳伦斯·马丁，在很早的阶段，就为我提供了学术上的指导。唐纳德·吉林、苏珊·埃克特、迈克尔·埃杰顿、罗伊·费希尔、A·汤姆·格伦菲尔德、雷普斯·赫德森、路易丝·蒙哥马利和葆拉·沙利文，帮我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已故的迈克尔·H·B·阿德勒与众不同，他在关键时刻对我进行鼓励。

许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给予了我重要的帮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的埃德加·斯诺资料组的工作人员。虽然从其它方面来说，这里并不是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心，然而斯诺资料组掌握了学者们所感兴趣的关于中国的一般性材料以及关于斯诺的材料，这些，都是很有用的。在这个资料组里，玛丽琳·伯林盖姆的重要作用是别人无法比拟的，她总是迅速、认真地回答我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达特茅斯学院贝克图书馆的肯尼思·克拉默以及格伦维尔·克拉克资料组，给了我以极大的帮助。布赖恩·沙利文、米里亚姆·迪斯曼和拉马斯·达菲的表现，证明他们是勤奋、高效的研究人员。

本书的一些内容最初曾刊登于《太平洋历史评论》和《密苏

---

里历史评论》。我充分采纳了他们在编辑中提出的建议，并在此感谢他们允许我把这些文章收入本书。

考虑问题周到、有耐心的彼得·谢泼德，的确无愧于“著作”代理人的头衔，他对我和这本书的关心总是胜过金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约翰·高尔曼，在我们共同为本书工作的几个月里，表明他自己是一个朋友和有才智的同事。

里贾纳·N·汉密尔顿尽管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仍然对全部书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并给予了我坚定不移的支持。马克斯韦尔·丁·汉密尔顿的作为则从始至终证明了，有些人是天生的好人。

## 序

1970年10月1日，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座古代建筑高高地耸立在北京的中心广场旁边，俯瞰着广场。在它下面，成千上万中国人列队走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纪念日。

斯诺即将完成一次惊人的长途冒险旅行。这次长途冒险旅行是从美国的密苏里开始的，正是在这个地方，斯诺萌生了一种既超越于自身又不受他人支配的浪漫幻想。这次长途冒险旅行使他取得了一系列新闻报道上的成就，包括那些关于中国在本世纪发展的最有预见性的报道。然而，在那黑暗的岁月中，这些报道却被他自己国家里的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所排斥。这次长途冒险旅行造就了一个人，他自称为世界公民，为了中国和美国之间最为至关重要的联系，他吃力地承担了全部的责任。

斯诺怎么会在10月1日那天站在从未有美国人到过的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长途冒险旅行又说明美国人对中国以至整个世界具有什么样的洞察力呢？

这些，就是这本传记的主题。

## 引言 青年时代

我只是在一次即兴采访中发现，查尔斯·怀特的判断最能概括埃德加·斯诺的一生。怀特是一位医生，他和斯诺一起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长大。小时候，这两个男孩都属于同一个西港中学兄弟会，一年夏天，他们在堪萨斯的麦地里劳动之后，一起去了加利福尼亚。从中学毕业之后，怀特仅见到过斯诺一次，至今他还能够回忆起他读过斯诺写的十一本书中的一两本的内容。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他搭乘船到了远东，踏上了斯诺在记者生涯中所走过的道路。30年代，斯诺在那里成了有关中国共产党情况的权威；40年代期间，斯诺是著名的《星期六晚邮报》的驻外记者，负责有关苏联、西欧和印度的报道；在令人痛苦的麦卡锡年代，他成了受各种攻击的对象，被指责为“反美”。怀特无法相信这些指责。

在沉思了片刻之后，怀特对我说道：“你知道，埃德并不是共产党。他象我们大家一样长大，只不过他比大家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埃德加·斯诺，生于1905年7月19日，一个炎热夏天的星期三，在堪萨斯城长大。此时，这个国家正满怀信心地期望着成为一个经济和道义上的世界强国。1972年，他在瑞士他的小农舍里去世，长期的越南战争这时已近尾声，这场战争留给美国人的是

疑惑和惊讶。

在这骚动的几十年里，斯诺的确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的许多同伴偶尔在假期里出国去做服务员，他却住在国外。他超出政府的宣传材料的陈规，独立于那些聚集在日常报道周围的记者们之外。他在新兴的革命运动中变得成熟了。这些新兴的革命运动推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昔日的殖民地上，几十个新国家按照它们自己的意愿崛起了。斯诺同情这些民族解放运动，他以浪漫的笔法记述它们。然而，他并没有丧失自己的美国人的个性。当其他人都在学着与20世纪形成的世界共同体友好相处时，斯诺却在固执地坚持那种孕育在大草原上的美国故事书中的理想——提高“小人物”的个人尊严，尊重民族自决权，颂扬这种自决权的极端表达方式——革命。

斯诺是在前线看20世纪历史的。他是第一批关注越南和缅甸农民起义的美国记者之一。他从战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苏联西部的前线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战争结束时溜进维也纳，写出了有关苏军占领下的奥地利的第一批报道；他注视着战时的美苏联盟的解体，演变为全球的冷战。他成为第二个进入利雅得的美国记者，现场报道了印度的独立和1948年刺杀甘地的事件。

斯诺在中国看到的最多。1936年，他看到了与西方断绝联系近十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面目。在他的报道中，他们并不象国民党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群“赤匪”；而是一股团结一致的、拥有忠实的农民追随者的力量。这不仅在海外而且在中国国内，都是奇闻。费正清对斯诺的长篇报道《红星照耀中国》作出了准确的评价：“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这本书，是关于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袖的生活、长征、共产党的游击战略以及关于革命期间的其它事情的原始资料，被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们视为“必读书”。1949年国民党失败之后，斯诺对共产党中

国的接近程度也是无人可比的。1960年，他是访问这个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有过中国经历的美国记者。他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记者，也是文化大革命后头一个回到这里的外国记者。

斯诺对行动主义的偏爱，使他自己深深地卷入了外国的事务。1935年，当国民党政府打算把华北割让给日本人时，他帮助北平的学生动员中国的社会舆论反对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期间，他帮助开展大后方工业化运动，这个运动在最高潮时组织了1,850个合作社。他写了许多文章，劝说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其他领导人。1949年以后，他试图在对立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美国之间架设桥梁。他雄辩地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他认为美国人不可能体面地取胜。

急剧变化的形势迫使斯诺犯了记者们常犯的错误。卷入历史事件逐渐使他的报道带上了色彩。但斯诺是杰出的。文学评论家马克斯韦尔·盖斯默把他列为美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虽然，斯诺在小说和诗歌方面的几次尝试完全失败了，但是他在运用“个人历史”的写作风格进行报道方面达到了最高水平，他本人在报道中的出现，不仅使报道变得更有趣和更可信，而且又不致于使事实失去光彩。然而，更重要的还不是他怎么写，而是他写什么。与人们的普遍印象相反，斯诺始终不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记者，而且是大事件的一个卓越的解释者。他不仅设法到了其他记者不去的地方，而且有能力理解他看到的和即将看到的。许多评论家逐渐看到了他的朴质。他可能会充满幻想，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国家，不过，他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

然而，从斯诺一生的戏剧性遭遇当中，从他的报道和美国人对他的报道的反应之间的紧张关系当中可以看出，他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的成就。在斯诺记者生涯的前半段，他大受欢迎并博得了喝采；而在后半段，他的作品却找不到地方发表。然而，他的

感情却始终不渝。在他的整个记者生涯之中，美国人看待他的作品如同看待中国一样，无不透过他们主观愿望的棱镜。30年代期间，美国人深感担忧，怕被拖进正在形成的世界大战。他们急切地接受了斯诺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与国民党人结成联合战线，发动当地人民抵抗日本人的报道。由于渴望看到反法西斯联盟，美国人忽略了斯诺的结论，即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他们所说的共产党人；他们用他的作品“证明”红军仅仅是农民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对斯诺来说，申明这是一种不完善的解释并没有什么好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对那些“失去了中国”的人进行政治迫害期间，美国人责备斯诺欺骗了他们，没有说明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的真实性质。又是由于看到红色浪潮“将撞击太平洋诸岛并淹没美国——一切都按照苏联的计划”，美国人忽略了斯诺的报道中关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接管中国之后，发展经济和社会所取得的成就，也忽略了他提供的消息：共产党人愿意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最后，悲剧并不是斯诺欺骗了美国人，而是他们没有认真听他的。

斯诺周围的各种紧张关系引起了对他的严重歪曲和相互矛盾的攻击，主要来自左边。自称为“独立社会主义者”的《每月评论》的编辑利奥·休伯曼，把斯诺叫做“只凭想象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毛可以喜欢斯诺，但他认为斯诺是资产阶级分子。还有美国共产党，当《红星照耀中国》刚刚出版的时候，美国共产党实际上对这书提出了唯一强烈的批评，给斯诺贴上了托洛斯基分子的标签。在斯诺的右边，站着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和那些把斯诺叫做野心家和共产主义工具的人一起，在国会中助长了这种恶毒的红色圈套，最后，国会强迫斯诺离开了美国。后来，1972年，尼克松在作出了对中国开放的历史性的决定之前不久，写了一封信给住在瑞士已身患癌症不久人世的斯诺，赞扬他的“杰出的生涯”。

尽管如此，斯诺并不是一个招惹是非的人。他的悲剧人物的性格并没有增加他的污点，却使他的心灵受到折磨并招来了周围的敌意。即使那些用最刺耳的言词指责他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批评家们，也承认他们喜欢他。正如斯诺作品的一个编辑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声称的：“埃德是一个我所愿意带回家见妈妈的记者。”斯诺不是爱慕虚荣和自负的人。当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就离开密苏里前往纽约，他没有头戴高帽手持拐杖，模仿沃尔特·李普曼那样绅士们的作派，也不玩弄诸如使用中间的名字一类的伎俩（斯诺的中间名字是帕克斯，他认为埃德加已经够糟的了。）

斯诺渴望冒险。他冒险经常凭着一时的冲动，但即使在年轻时，他不是乖僻、野蛮的。年轻的约翰·里德在动身去苏联之前，在纽约富尔顿大街的码头上嬉戏直到深夜，喝得醉醺醺的。斯诺却是独自一人在码头平静地漫步，幻想着旅行。

在听众面前装模作样会使斯诺很不自在，他害怕这样做。从他的性格来说，他不是说话声音尖锐刺耳的、伪善的或爱发脾气的人。当他的第一个妻子，爱激动的佩格·斯诺和什么人激烈争论的时候，他总是从容地走开。与斯诺同一个时代的记者，例如他所喜爱的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或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都是在与对立面的斗争中成长的。斯诺则不然。从年轻时起，他就平静地走他自己的路，因为他作为一名辅祭不愿意失去对天主教的信念。他知道教堂对他的母亲有多么重要，直到离家之前，他都没有间断过去做弥撒。他是那种愿意和姐姐跳舞的男孩子。他的姐姐米尔德丽德，在离家不远的杰克——欧兰顿冷饮店工作。50年代，他拒绝写那些无甚争议的文章和保留他在《星期六晚邮报》的工作，虽然同事们都认为他倔强得象一头密苏里骡子，但他却想要得到美国人民的承认。

现已掌握的材料表明，埃德加·斯诺的真实情况，正如查尔

斯·怀特知道的那样，不仅是由于在他那惊人的旅行中所见到的，也是由于他的身世所造成的。虽然斯诺的青年时期并没有什么可以表明他日后会成为杰出人物或是有争议的人物，但他所生长的环境和他年轻时的个性为他的一生撰写了意味深长的序言。埃德加·斯诺，在他成为一个成熟的男子汉时认识他的另一位朋友写道：“永远是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人。”

由于密苏里州远离美国边境，密苏里州人喜欢把这个州看作是他们的强大国家的一个缩影。在斯诺的青年时期，堪萨斯城以惊人的速度和信心从一个小城镇转变为工业化的大城市。狂奔的马车和漫不经心疾驶的汽车造成了多起致命的交通事故。斯诺出生几天后出版的该市1905年工商名录表明，“大都市铁路”每年运送旅客达7,700万人次，在5年内增长量超过了三分之二；不动产的让渡一跃为1900年的250%。当地的商会把堪萨斯城称为“最美国化的城市”，市民们也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大草原上其他人的榜样。斯诺4岁那年，当地商业俱乐部的100名成员和50名其他的商人，包租了一辆专列载着他们游历了密苏里、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3个州的83个城镇，行程1,400英里。他们希望见到170,000人并使这些人意识到堪萨斯城的积极性进取精神和他们的口号“继续发展”。

炼油厂、汽车装配厂、制造服装和油漆的工厂在大草原上出现了。到了埃德加·斯诺上中学的时候，密苏里的工业生产产值超过了农业生产产值。这个州的制造业在全国名列第11位。

从农业的美国到公司的美国的这种变迁，使这个独立的农民由于出众的成就而变为人们崇拜的偶像。但是在斯诺的少年时代，堪萨斯城的男人们和女人们都还记得，他们的父辈最初在改造故乡的大草原时，并没有任何使之成为理想中的乐园的经验。堪萨斯市民们墨守密苏里农民的保守观念“眼见为实”。一位历史学家描述道，他们认为“美国的希望在于自由的市民普遍拥有

土地所有权，因而免受高压统治。”

堪萨斯城的历史和它在密苏里州的地理位置，使堪萨斯人很重视自己自立的感情。历史学家保罗·内格尔敏锐地发现并指出：“由于是投机冒险，这个城市从一开始和至今仍然是由一家私人公司建立的。”这个城市总给人一种变化感。它从不给人一种社会的稳定感。此外，这个城市的人不满意它在这个州的地位。一道宽阔的鸿沟把它和东边的圣路易斯分隔开来。圣路易斯虽然和它同在一个州内，却具有更多的大西洋沿岸文明。堪萨斯城则面向西部那片陌生的土地。因此，堪萨斯的市民是多疑和极端个人主义的。

堪萨斯人的这种道德观念，在该城的政治家们身上得到了突出的体现。由吉姆·彭德格斯特创建并由他的弟弟汤姆加以妥善协调的政治机器，因左右了当地的政治生活而享有极高的声誉。虽然彭德格斯特们经常令人瞩目，可是他们不能忽视平民的情绪。汤姆允许市民们非法酿酒并降低了电话费。当他开庭的时候，任何企望得到偏袒的人都得依次等候，而不论那人在城里的地位如何。即便如此，堪萨斯市民们也不总是让彭德格斯特们当道。彭德格斯特在竞选中屡次落选，汤姆最终进了监狱。

物质方面的追求和个人主义的双重观点，是斯诺继承的一部分遗产，虽然他来自东部的祖先们是通过不同的路线和有着不同的背景的。

斯诺的母亲，安娜·凯瑟琳·埃德尔曼，是这个家庭中第一代美国人。她的母亲，玛丽·福加蒂，是爱尔兰提珀雷里郡的梅耐福人；她的父亲约翰·H·埃德尔曼是德国人，出生于西里西亚。埃德尔曼一家向西迁移到堪萨斯城；途经哥伦布，安娜1878年就在那里出生了。约翰·埃德尔曼，是个粗暴的老人，当埃德加·斯诺懂事时，他拥有一家建筑公司。玛丽·福加蒂在人

们的印象中是个可爱的妇女，她和城里的其他爱尔兰亲戚们在提到英帝国主义时，言词都很尖刻。这种情绪在中西部人中间非常盛行。

埃德加·斯诺的父亲的亲戚们，支配着斯诺的家庭圈子，他们深深植根于美国的过去。埃德加·斯诺的第五代祖先威廉·斯诺是弗吉尼亚州人，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后来，他带领全家在肯塔基州坎伯兰山定居。埃德加·斯诺成年后曾特别自豪地指出，在肯塔基的斯诺家没有保留奴隶。尽管年轻的斯诺拿不出更多的证据，但他当时仍然自夸他的一个祖先是在“五月花号”第二次远航时来到美国的。在他成年后，每当评论家们询问他的美国家世时，斯诺总是玩弄概念，说他的祖先包括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塞缪尔·斯诺，那是独立战争后的某个时期美国驻广州的首任商业领事。

埃德加·斯诺的祖父霍勒斯·帕克斯·斯诺有一副铁石心肠。他的农场从肯塔基州不断向西扩展，他用从土地上挣来的钱，在堪萨斯州温菲尔德的主要街道上建了一家百货店。到他去世的时候，3个州的土地上都有了他的农场。他能用他在银行里的存款利息抵销他每年的开支。每年夏天，他的孙子们到他的家庭农场来玩，可以见到他的牛群遍布堪萨斯州的伯登一带。霍勒斯经常对孙子们吹嘘自己，说他这辈子没有给别人干过一天活。

埃德加·斯诺的父亲詹姆斯·埃德加·斯诺，1873年生于肯塔基州，即霍勒斯举家西迁至堪萨斯的7年前。人们都说，詹姆斯离开了父亲的农场却仍然接受父亲的资助。他曾在伯登附近的西南学院里工作过不长时间，挣钱偿还霍勒斯，并为此而自豪。为寻找工作，他到了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在那里，他遇见了安娜·埃尔默曼，并于1899年6月娶她为妻。他为一家羊皮代理公司，在盐湖城和芝加哥工作了几年之后，定居在堪萨斯城。他用存